

曹葆華 張禮修譯

В. И. ЛЕНИН

ДОКЛАД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К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本書是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二十八卷
第一八〇至二〇四頁所載原文譯出的。

目 錄

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	一
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的結論	二四
簡要註釋	三六

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二)

同志們，由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問題，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擔負着一些任務，現在我就是想談一談這些任務。毫無疑問，最近的一些事變將這個問題提到了日程上，因為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動，如像布列斯特和約的廢除、德國的革命、德國帝國主義的崩潰以及英、美帝國主義的腐朽，都不能不破壞那些構成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理論基礎的許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原理。俄國的軍事形勢，英法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攻擊，都不能不推動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或多或少地站到我們這一邊來。今天晚上我就是想談一談我們的策略所應當有的變更，談一談我們面前所出現的新的任務。

讓我從幾個基本的理論原理談起。毫無疑問，作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經濟基礎的主要社會階層，在俄國乃是中農。毫無疑問，在一個農民人口為數極多的國家內，社會主

義的變革以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不可避免地要採取特別的形式。所以，我首先想提醒你們一下，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態度的基本原理是怎樣形成的。爲了提醒你們這一點，我來談一談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的幾個論點。這篇文章是以單行本出版的，是在一八九五年或一八九四年寫成的，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對於農民的土地綱領問題實際上已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因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布列斯拉夫代表大會上曾經討論了這個綱領^①。請看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的態度是怎樣說的：「我們對小農的態度是怎樣的呢？……第一，法國綱領的下列命題是完全正確的，即我們預見到小農不可避免地要滅亡，但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這種滅亡。第二，同樣顯而易見，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用暴力去剝奪小農（有無賠償是無關重要的），就像我們對於大土地佔有者所不得不作的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在於：將其私人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權變爲協作社的生產和協作社的所有權，但決不是使用強迫的手段，而是憑藉提供範例和建議社會幫助以達到這一目的。」

其次，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說：「我們永遠也不能許諾小農保持他們的個體經濟和個人財產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優勢力量。我們只能許諾他們：我們不會違反他們的意

志以暴力來干涉他們的經濟關係。」(2)

最後，我想提醒你們一下最後的一句格言，——這是論述富裕農民、大農（俄國話叫「富農」）、即不使用僱傭的勞動力就不成的那些農民的。如果這些農民不懂得他們現在的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要滅亡，不會給自己作出必要的結論，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是什麼也不能為他們做的。我們的義務就只是幫助他們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3)。

這就是我想提醒你們的幾個原理，毫無疑問，這些原理是任何一個共產黨員都知道的。從這種原理我們看到：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在大資本主義制度佔優勢的國家內和在落後的小農、中農和大農佔優勢的國家內，無論如何是不可能一樣的。我們看到，當我們說對於地主剝削者進行戰爭是我們的義務的時候，我們是完全確切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任務的。

對於中農我們說：無論如何不能用任何暴力。對於大農我們說：我們的口號就是使他們服從糧食的壟斷；當他們破壞糧食壟斷的時候，當他們隱藏糧食的時候，我們就和他們作鬥爭。不久以前，我曾在一個幾百人的大會上——這些人是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時來到莫斯科的鄉村貧農委員會的代表——重複了這些原理。在我們黨的文獻中，在

宣傳和鼓動中，我們總是強調我們對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態度的不同之處。雖然大家在理論上都同意了，但是還遠非大家，而且還遠非够快地作出相當的政治結論來。我可以說有意從遠處開始，是爲了向大家表明，我們應當遵循關於各階級相互關係的什麼樣的經濟概念，以便在無可爭辯的基礎上提出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策問題。毫無疑問，這個小農階級（我們把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那些農民稱爲中農階級），這種農民在俄國無論如何是主要的經濟階級，它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各式各樣政治派別的基礎。在我們俄國，這些派別與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聯系最多。俄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有着布爾什維克和這些黨派的長期的鬥爭，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經常把這個鬥爭看作社會主義內部的鬥爭，即看作俄國社會主義的分裂。附帶地說，這樣的觀點甚至在很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發言中也常常流露出來。

剛巧今天有人轉給了我弗里特里赫·阿德勒（這個人以其在奧地利的革命行動而聞名）的信。他的信是在十月底寫的而在今天接到的，信的內容只是一個請求：能不能把孟什維克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在這樣的時刻，除了這個請求，他再也找不到更聰明的話來寫。誠然，他附上了條件說，他不知道我們的運動等等，但這終究是值得注意的。西歐

社會主義者的這個可笑的錯誤是由於下列事實：他們是向後看的，而不是向前看的，他們不明白，不論是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宣傳社會主義）都不是應當歸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一九一七年整個革命時期所做的，只是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他們從來就不能站在正確的立場上，而且似乎是有意地說明了馬克思的這個原理，即小資產階級在存亡攸關的決戰裏是不能夠站在任何獨立的立場上的。

無產階級從一開始起，從它成立蘇維埃起，就本能地以建立蘇維埃來表明明確的階級立場。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直在動搖中。如果他們自己的朋友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和夏天把他們叫做「半布爾什維克」，那末這不僅是俏皮話，而且是很正確的特徵描述。不論對於哪個問題（比方說，蘇維埃問題，農村中的革命運動問題，直接佔領土地問題，前綫上的聯歡問題，支持或不支持帝國主義問題），在所有這一切根本問題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今天說「是」，明天却說「不是」。一方面，他們幫了忙，另一方面，又不幫忙，他們是沒有氣節和束手無策的典型。另一方面，當他們向人民拋擲「擁護蘇維埃」的空話時（要知道他們一直把蘇維埃叫作「革命民主派」，而與那被稱為有資

格的一部分人對立起來），這不過是他們的狡猾的政治手腕，而廣大羣衆得到這個，便心神迷醉起來：「這是擁護蘇維埃呀！」孟什維克的宣傳有一部分也是爲我們服務的。

這個問題很複雜，有着很豐富的歷史，我只須簡要地指出來就夠了。所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這個政策，在我們眼裏是徹底證明了我們的一個論點：把他們認作社會主義者——這是一個錯誤。大概，他們只是口頭上和記憶裏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他們只是俄國的小資產階級。

我是從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中農的問題談起的，換句話說，即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各黨派的問題談起的。我們現在正接近這樣的一個階段，即爲了正確地估計當前的轉變，應當改變我們在革命前一個時期的口號。你們知道，在十月和十一月間這些分子是動搖的。

布爾什維克黨當時是不可調和的，這是做得很對的；我們對自己說，我們必須消滅無產階級的敵人，我們必須在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代表權、蘇維埃政權各個基本問題上進行戰鬥。在這一切問題上，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們沒有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妥協，我們是做得很正確的。

事件往後的進展，給我們提出了關於和平與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你們知道，布列斯特和約使小資產階級分子離開了我們。

從這兩個情況，即從我們據以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對外政策，以及從我們與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主幻想所作的無情的鬥爭，從我們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無情的鬥爭，——從這兩個情況可以看到：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急劇地離開了我們。你們知道，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開始動搖了。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走向冒險，另一部分人互相謾罵，而且謾罵到現在。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當然，我們是一分鐘、一點兒也不會懷疑我們的政策在當時是絕對正確的。現在來證明這一點，就是舊調重彈，因為德國革命已經最大限度地證明了我們觀點的正確性。

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指責我們最多的是哪一點呢？我們從不大覺悟的工人羣衆那裏最常聽到的是什麼呢？這就是：我們白白地希望寄托於德國革命，而這個革命一直沒有發生。德國革命駁倒了所有這些指責，證明了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即是，這個革命一定要到來，我們不僅要以民族戰爭與德國帝國主義作鬥爭，而且要用宣傳及從內部瓦解它的方法來與它作鬥爭。事變如此地證實了我們是正確的，在這裏無須什麼證明了。

關於立憲會議也一樣，在這裏動搖是不可避免的，事變的進程如此地證實了我們觀點的正確性，所以，現在在西方已經開始的一切革命都在蘇維埃政權這個口號下進行，而且將建立這種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這就是各國革命的特徵。蘇維埃從奧地利和德國傳播到了荷蘭和瑞典（傳播到了有着最舊的民主文化的國家，這些國家甚至與德國比較也稱自己爲西歐）。在那些國家裏，提出了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民主在歷史上的崩潰，並不是布爾什維克杜撰出來的，而是絕對的歷史必然性。在瑞典和荷蘭，幾百年前就已經有了政治鬥爭，而現在那裏提出了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並不是爲了求得布爾什維克的青睞。這就是說，我們正確地估計到了現在的情況。事變的進程如此地證實了我們策略的正確性，所以，無須長久地停留在這個問題上了。不過應該明白，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有最深的偏見的問題。你們只要回憶一下西歐各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和議會制度發展的歷史，你們就會看見，在各個國家四十年代的舊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這種偏見佔着統治地位。在法國，這種觀點保持得最久。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在議會制度的問題上，是最愛國的，如果把它與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相比較，它是最愛國的。大資產階級是更國際化的，因爲小資產

階級是比較不活躍的，它與其他各國人民沒有這樣的聯系，並不捲入世界的商業周轉中。因此，應該預料到，正是在議會制度的問題上，小資產階級應當表現得最多。在俄國也就是這樣。在這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這一點，即我們的革命與愛國主義作了鬥爭。我們在布列斯特和約的時代裏，必須反對愛國主義。我們說：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就應當爲了國際革命犧牲自己的一切愛國情感，國際革命現在還沒有，但它是要到來的，如果你是國際主義者，你就應當相信它。

很明顯，我們這樣說，只能夠吸引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到我們這一邊來。很明顯，大部分小資產階級是不贊同我們的觀點的。我們不能期待他們的贊同。小資產階級怎麼會轉到我們的觀點上來呢？我們必須實現形式最嚴峻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幾個月內就經歷了迷戀於幻想的時代。如果你們看一看西歐各國的歷史，那裏經過幾十年也沒有根絕這個幻想。看一看荷蘭、法國、英國等等的歷史吧。我們必須粉碎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他們認爲，人民是某種統一的東西，人民的意志是可能表現於階級鬥爭之外的其他什麼東西上的。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作任何妥協，我們是完全正確的。假如我們縱容了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立憲的幻想，那末，我們就會葬送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部事業。

我們就會因狹隘的民族利益而犧牲國際革命的利益；而國際革命是沿着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前進的，因為它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使得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離開了我們。他們去到街壘的那一邊，他們出現在我們敵人的一邊。當杜脫夫分子的暴動開始時，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杜脫夫分子、克拉斯諾夫分子和斯克洛柏特分子的組成部分中有和我們作鬥爭的政治力量。在我們這一邊的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

你們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叛亂進行得很成功的時候，全俄各地發生了富農暴動。只有城市無產階級和農村接近，才鞏固了我們的政權。無產階級依靠了貧農才堅持了反對一切敵人的鬥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極大部分是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杜脫夫分子和克拉斯諾夫分子一邊的。這種形勢要求我們進行最殘酷的鬥爭，以及採取進行這個戰爭的恐怖手段。不論人們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來譴責這種恐怖手段（而這種譴責我們是從一切動搖的社會民主黨人那裏聽到的），我們很明白，這種恐怖手段乃是尖銳的國內戰爭所引起的。這是因為整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我們才引起的。他們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內戰、收買、怠工——來與我們作鬥爭。就是這樣的條件造成了使用恐怖

手段的必要性。因此，對於恐怖手段我們是不應當後悔和放棄的。不過，我們應當清楚地了解，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什麼條件引起了鬥爭的尖銳化。這些特殊條件是在於：我們必須反對愛國主義，我們必須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來代替立憲會議。

當國際政治發生變動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狀況不可避免地也要發生變動。現在，我們就看到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陣營在情緒上的變化。在孟什維克的宣言裏，我們看見他們號召人們拒絕與有產階級聯盟，看到孟什維克對自己的朋友——與杜脫夫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和英國人結了同盟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的人們——發出的號召。他們向這些人發表宣言，要他們起來與英、美帝國主義作鬥爭。現在，每個人都明白，除了英、美帝國主義，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對抗了。在社會革命黨人中間，在知識分子中間有着這樣的一種動搖，而知識分子最同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偏見，也最富於愛國主義的成見。在知識分子中間也進行着同一個過程。

現在，我們黨的任務是在於：我們在製定自己策略的時候要以階級關係作為指針，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正確地認識到：這是偶然性，是毫無氣節的表現，毫無根據的動搖的表現，或者相反地，這是一個有着深刻的社會根源的過程。如果我們從理論上所規定了

的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態度方面，從我們革命的歷史方面來看一看這整個問題，我們就會看到，對於回答是不應該懷疑的。這個變革不是偶然的，不是個人的。它關聯着千千萬萬人，這些人處在俄國中農或是與中農相當的地位上。這個變革關聯着整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憤怒地反對我們，甚至到了瘋狂的地步，因為我們必須粉碎它所有的愛國主義情感。可是，歷史使愛國主義現在轉向我們這方面。十分明顯，除了用外國的刺刀以外，再也不要想打倒布爾什維克。如果在這以前還相信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是真正的民主派，如果在這以前還保留着這個幻想，那末，他們向奧地利和德國所提供的和約，現在是徹頭徹尾揭破這個幻想了。英國人表現得好像是抱着專門的目的要證明布爾什維克對國際帝國主義看法的正確性。

因此，從那些和我們鬥爭過的黨派中間，例如，從普列漢諾夫營壘中間，便發出了呼聲，他們說：我們錯了，我們認為德國帝國主義是我們主要的敵人，而西方國家——法、英、美——則帶給我們民主制度。原來，這些西方國家所提供的和約比我們的布列斯特和約更加百倍地凌辱、劫掠和搶奪。原來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充當了絞殺俄羅斯自由的劊子手和憲兵，就像尼古拉一世充當俄羅斯劊子手這個角色一樣，他們並不亞於那些

在絞殺匈牙利革命時充當劊子手的國王們。現在這個角色由威爾遜的一些代理人担任了。他們絞殺奧地利的革命，他們扮演憲兵的角色，他們向瑞典提出最後通牒；如果你們不與布爾什維克政府作鬥爭，我們就不給你們麪包。他們向荷蘭宣稱道：不要擅自接受蘇維埃大使，否則我們就實行封鎖。他們的武器很簡單——一條飢餓的繩子。這就是他們絞殺各國人民的法寶。

最近的歷史、大戰時代和大戰以後的歷史，其特點是發展非常地快，它證明了一個論點：英、法帝國主義也像德國帝國主義一樣是卑鄙醜惡的帝國主義。請不要忘記，在美國我們有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但是這絲毫也不妨礙帝國主義在那裏像野獸一樣橫行無忌，在那裏不僅僅用私刑拷打國際主義者，而且連羣衆也將他們拖到大街上，把他們剝得精光，塗上松脂，點起火來燒。

這些事件非常有力地揭露了帝國主義，提出了這個問題：或者是蘇維埃政權存在，或者是革命被英、法帝國主義全部絞殺。這裏已經談不上什麼與克倫斯基的協議了。你們知道，他們已經把克倫斯基像擠乾了的檸檬一樣地丟開了。他們是同杜脫夫和克拉斯諾夫一道的。現在小資產階級走過了這個階段。愛國主義把他們推向我們，——結果是

這樣，歷史迫使他們這樣行動。於是我們大家應該估計到全世界歷史的這個廣大經驗。不能保衛資產階級，不能保衛立憲會議，因為它實際上是對杜脫夫和克拉斯諾夫之流有利的。這似乎很可笑：立憲會議怎麼會成了他們的口號。可是事實如此，因為立憲會議還是在資產階級佔上風的時候召開的。立憲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機關，而資產階級是在那些實行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帝國主義者一邊的。資產階級準備採取一切手段，用最卑劣的方法來絞殺蘇維埃政權——將俄國出賣給誰都行，只要能消滅蘇維埃政權。

這就是導致國內戰爭的政策，就是迫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轉過身來的政策。當然，在這部分人中間動搖總是不可避免的。當捷克斯洛伐克人得到頭幾個勝利時，這一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散播謠言，說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勝利是一定的。他們從莫斯科發出了電報，說莫斯科已處在陷落的前夜，說莫斯科已被包圍了。我們清楚地知道，只要英國人和法國人甚至取得一些極其微不足道的勝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會首先失去理智，張皇失措，開始散佈我們的敵人勝利的各種謠言。但是革命表明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起義的必然性。現在我們的「同盟者」成了俄國自由和獨立的主要敵人。如果不鞏固蘇維埃政權，俄國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會成爲獨立的國家。這就是爲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

更。由於這個變更，我們現在就肩負着一個任務——規定自己的策略。過去一個時期我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協議，小資產階級是反對我們的，我們的不可動搖性要求我們實行恐怖手段；誰如果打算把那個時期我們革命鬥爭的口號機械地搬到現在來，那他就大錯特錯了。現在這將不是不可動搖性，而簡直是愚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策略了解不夠。當我們必須締結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從狹隘愛國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步驟是對俄國的叛變；而從世界革命的觀點看來，這是一個正確的戰略步驟，它給了世界革命以最大的幫助。世界革命正是現在，在蘇維埃政權成了全民制度的時候爆發起來的。

現在，雖然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還是繼續在動搖，它的幻想却已經破滅了。當然，我們應當像估計其他一切條件一樣估計到這種情況。假如原先我們抱着別的觀點，那末小資產階級就會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邊，而暴力也就不可避免，因為戰爭就是戰爭，我們應該像在戰爭中那樣行動。可是現在，當這些人開始轉向我們的時候，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我們以前在傳單和報紙上的口號不是這樣而就避開他們。當我們看到他們向我們轉過半身的時候，我們就應當從新寫我們的傳單，因為這些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對我們的態度已經改變了。我們應當說：歡迎歡迎，我們是不怕你們的。如果你們以為我們只會

使用暴力，那你們就錯了。我們是可以達到協議的。而那些滿抱着慣例和資產階級偏見的分子的，一切合作社人員，一切與資產階級聯系最密的勞動者，是會走向我們的。

就拿整個知識界來說。知識界過着資產階級的生活，它習慣於一定的方便條件。既然它動搖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一邊去了，那末，我們的口號就是無情的鬥爭——恐怖手段。由於現在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情緒起了這樣的變化，我們的口號就應當是協議，是建立善鄰關係。當我們遇到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宣稱他們想對蘇維埃政權保持中立的時候，我們就應當說：「中立」和善鄰關係——這是陳舊的廢物，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是毫無用處的。這不過是陳舊的廢物，但是我們應當從實事求是的觀點來討論這個陳舊的廢物。我們始終是這樣看的，而且從來也沒有期望過小資產階級分子成爲共產主義者。但是實事求是的建議我們是應當商討的。

我們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時曾經說：無產階級應當是統治其他各個階級的階級。我們不能在共產主義徹底實現之前消滅階級差別。在我們沒有消滅剝削者——大資產階級和地主之前，階級仍然會存在，而這些剝削者我們要無情地剝奪他們。但是對於中農和小農，就應該作另外的說法。在無情地鎮壓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小資產階

級民主派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當他們說他們願意中立並和我們保持善鄰關係的時候，我們回答道：我們需要的也就是這個。我們從來也沒有期望過你們會成爲共產主義者。

我們要繼續站在無情地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立場上。在這裏我們是無情的，在這裏我們不能走上任何妥協或調和的道路。但是我們知道，用任何命令使小生產轉爲大生產都是不行的，這裏需要以事變的進程來逐漸證實社會主義的不可避免性。這些分子永遠也不會變成在信念上的直接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只有當他們看到沒有出路時，才會成爲社會主義者。現在他們看到：歐洲就這樣垮台了，帝國主義到了這樣的地步，竟致沒有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派能拯救他們，而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拯救他們。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僅不懼怕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這種中立態度和善鄰關係，而且還表示歡迎。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如果從實行專政的這個階級的代表觀點去看問題的話，我們就會說：我們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決不指望更多的東西。對於我們這就足够了。你們將和我們保持善鄰關係，而我們將有國家政權。我們在你們關於「同盟者」的演講以後，很樂意使你們這些孟什維克先生們合法化。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將做這件事。但是我們也沒有忘記，在你們黨內還存在着孟什維克——「積極分子」，而且對於他們，我們的鬥爭方法還

是舊的方法，因為這些「積極分子」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朋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人未被趕出俄國，你們也同樣是敵人。我們爲自己保留國家政權，只是爲自己。對於那些對我們採取中立態度的人們，我們要以這樣一個階級的立場來考慮問題，這個階級掌握了政權，它將自己武器的鋒芒指向地主和資本家，它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如果你們高興到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克拉斯諾夫分子那邊去，——我們已經表明我們過去是如何鬥爭的，我們今後也將進行鬥爭。如果你們高興學習布爾什維克的榜樣，——我們就走和你們協議的道路，因為我們知道，不通過一整系列的協議（我們是要嘗試、審查、比較這些協議的），國家就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

我們一開始就走了這條路，例如，我們通過了土地社會化的法律，並把它逐漸變成一種措施，使得貧農得以團結在自己周圍並反對富農。只有隨着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勝利，我們才能不斷地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土地佔有制和公共的土地耕種制。除了依靠農村中純粹的無產階級運動，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執行的，而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伴待我們去做。毫無疑問，在這裏只有實際經驗，只有現實才會告訴我們應該怎樣行動。

和中農、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合作社人員協議的任務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們在

對待還保存着小資產階級傳統習慣的聯盟方面提出這個任務，那末這個任務將會有變更。如果我們談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末這個任務還要有某些變更。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動搖的，但他們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變革是需要的。我們知道，只有使用具有大資本主義文化的分子，才能建設社會主義，而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分子。如果我們不得不與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那末，這不是共產主義責成我們這樣做的，而是那促使一切「民主分子」及一切鍾情於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們離開我們的事變進程責成我們這樣做的。現在出現了利用這些知識分子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了，這些分子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他們永遠不會有共產主義思想，但是現在客觀的事變進程和對比關係使他們以中立和鄰居態度對待我們。我們永遠也不會依靠知識分子，我們只依靠那率領着一切無產者和全部農村貧民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不可能有其他的依靠。但依靠實行專政的階級是一回事，而統治其他各個階級又是一回事。

你們記得恩格斯甚至對於那些使用僱傭勞動的農民也說過：可能無須全體加以剝奪。我們按照一般的規則來剝奪，而在我們的蘇維埃內部是沒有富農的。我們鎮壓他們。如果他們鑽進蘇維埃來妄想窒息貧農，我們就從肉體上鎮壓他們。你們看，這裏是

如何進行一個階級的統治的。單是無產階級也就能够實行統治。但這個統治對待小農是一個樣子，對待中農是另一個樣子，對待地主又是一個樣子，對待小資產者更是另一個樣子。全部任務是在於：我們要能够了解這個爲國際條件所引起的轉變，要能够了解在過去半年的革命歷史中所習慣了的口號必須加以改變，因爲我們所談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我們應當說：我們仍然爲同一個階級保持政權。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我們的口號是協議，但是我們曾被迫採用過恐怖手段。如果你們真正同意以善鄰關係和我們共處，那末，合作社人員和知識分子先生們，你們要勞神完成某些任務。如果你們不成，那你們將是法律的破壞者，將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要和你們作鬥爭。如果你們站在善鄰關係的立場上，完成這些任務，這對於我們就綽綽有餘了。我們的靠山是牢不可破的。對於你們的軟弱性我們從來也未懷疑過。但你們是我們所需要的，這一點我們並不否認，因爲你們是唯一有文化的分子。

假如我們無須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分子來建設社會主義，那末任務就容易了。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也正在於我們必須用爲資本主義社會所完全腐化了的分子來建設社會主義。過渡的困難也正在於它是與那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的專政分不開的。由

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我們認爲無產階級將決定路綫，無產階級已受過訓練並已變成能够粉碎資產階級的戰鬥力量。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站着過渡階段的羣衆，我們對待他們的政策現在應當走上那些在理論上已被規定的軌道，現在我們能够實現這個政策了。我們面臨着許許多多的任務，許許多多的協議和技術任務，我們既是實行統治的無產階級政權，就應當善於提出這些任務。我們對於中農應當提出一個任務，即幫助商品交換，揭露富農。對於合作社人員應當提出另一個任務：他們要掌握大規模分配產品的機器；我們必須把這個機器拿到自己手裏。對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提出完全另外的任務；他們沒有能力繼續怠工，他們情緒不壞，現在對於我們是採取最善鄰的立場，於是我們應當採用這種知識分子，給他們一定的任務，注意和檢查這些任務的執行情況，對待他們就像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工作人員所說的那樣：「每一個雇主都善於給自己挑選適合的助手、會計員，如果他們犯了錯誤，他就善於改正他們的錯誤，如果他們不中用，他就善於用新的好的工作人員代替他們。」^[5] 我們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們來建設政權。如果我們連知識分子這樣的資本主義文化遺產都不利用，那我們就不能建設政權。現在我們可以像對待在國家政權嚴格監督下的善良鄰居一樣來對待小資產階級。在這裏

覺悟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了解；統治不是意味着他們自己去完成這一切任務。凡是作如此想法的人，都是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概念的，是從一年來的革命和專政中間什麼也沒有學到的。這樣的先生們最好送到學校裏去，在那裏學一些什麼東西，而在過去時期曾經學到了一些東西的人，他就會對自己說：就是這些知識分子現在我要使用在建設上面。對於這個，我在農民中間是有足夠的依靠的。我們應當記住，只有在這個鬥爭的進程中，只有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許多的協議及協議嘗試中，才會完成引導到社會主義的那個建設。

讓我們回憶一下，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應當做出榜樣來。在共產主義沒有徹底實現以前，任何一種形式都不是最後的形式。我們不能妄自認為我們知道正確的道路。但是我們要走向共產主義，這是一定不移的、必然的。現在每個星期所提供的東西比和平時期的幾十年還要多。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以來的半年，曾經是反對我們的動搖時代。西歐的革命是開始把我們的情況重覆一遍的例子，它一定會鞏固我們。我們必須估計到已經發生的變更，估計到一切因素，不要作任何幻想，因為我們知道：只要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完全勝利，動搖分子終將是動搖分子。可能這樣的革命不會如此迅速，雖

然德國革命事件的進程使人們希望這將比許多人所設想的要快些。德國革命是像我們的革命一樣發展的，但它是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無論如何，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和英、美帝國主義作殊死的鬥爭。英、美帝國主義感覺到了布爾什維主義已成爲一種世界力量，而且正因爲如此，所以它竭力想以最快的速度宰死我們，他們想首先鎮壓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然後再鎮壓自己本國的。

我們應當利用那些被帝國主義者的獸行推向我們的動搖分子。而我們也將這樣做。你們知道得很清楚，在戰爭中是不可忽視任何幫助的，那怕是間接的幫助也罷。在戰爭中甚至各個動搖階級的狀況也有巨大的意義。戰爭愈激烈，我們對於走向我們的動搖分子就愈應當具有影響。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我們已經實行了半年的策略，應當依據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各個不同階層的新任務，而有所變更。

如果我們能引起黨的工作同志注意這個任務，喚醒他們根據有系統的經驗來得出正確的決議，那末我就可以認爲我的任務是完成了。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與六日「真理報」第二六四號與第二六五號

依據「真理報」按照速記稿校訂過的原文排印

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 報告的結論

同志們，現在我必須作幾個結論。首先，我想就這裏談到的教條問題作一個答覆。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很多次：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想，這一點我們應該首先注意，而且要給以最大的注意。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不是我們背得爛熟的教條。應該把它看做行動的指南。我們始終這樣說，而且我認爲，我們在行動上是適當的，我們從未陷入機會主義，而只是改變了策略。但這無論如何不是背棄學說，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爲機會主義。我曾經說過，而且要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說：這個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其次，我談一談斯杰克洛夫同志的問題——我們將和誰協議，和參謀部還是和羣衆？我的回答是：首先，當然是和羣衆，然後才和參謀部，假如不能不與參謀部作鬥

爭，那末一切都要取決於個別的情況。我來談這個問題，但是目前實際上我沒有看見同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協議的任何可能性。有人對我們說，協議就是要放棄一些什麼。那末，你們將放棄什麼呢？你們將如何背棄基本路線呢？這將是一種背棄，而如果這僅僅是在實踐裏，這就不是新奇的事情。自然，我們永遠也不會放棄我們的原則。現在談這個問題是沒有意思的了。十五年前關於基本路線和原則的問題進行過爭論，當時我必須進行這些爭論，可惜，主要是在國外，而不是在俄國。然而現在所談的是國家權力，至於放棄一些什麼權力，——這根本就談不上。難怪威爾遜宣稱：現在我們的敵人是世界布爾什維主義。全世界的資產者都這樣宣稱。如果他們準備向我們進軍，那末，這就是說，他們承認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不僅是俄國的現象，而且是世界的現象。假如布爾什維克竟建議和資產階級進行什麼協議，那末他就太可笑和可憐了。而且當革命的火焰燃燒到一系列國家的時候，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會進行協議而且能進行協議。

瑞士的資產階級，在最近的事變開始發生時，便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是俄國人，我們不能給你們政權。薩杜里上尉，他是贊成布爾什維主義的，他這樣寫道：他一看到俄國資產階級令人驚異地馴服，就感到驚異。他並且說，他們法國的資產階級將不會這

樣。在那裏我們將看到更大的憤怒，如果爆發國內戰爭，那將採取最殘酷的方式，而且就不可能提出任何這類的問題。

一年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任何一個農民，任何一個工人都不會想到與資產階級進行協議。協議並不是什麼新東西，這是我完全同意的。我不過想讓我們一起來商討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些特別促使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小知識分子離開我們的情況，——在德國帝國主義進攻的時期，我們為爭取布列斯特和約而進行的無情的鬥爭，——現在已經過去了。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那怕是暫時的勝利，也將引起這些知識分子和小民主派的新動搖，他們將開始散播驚惶情緒，從隊伍裏跑開，這些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和他們協議，是要達到一定的結果，而且是為了一定的實際工作。這個策略既不會引起爭論，也不會引起驚奇。但是這個策略並沒有為大家所理解，這是很多人，甚至像馬克西莫夫同志這樣有威信的莫斯科蘇維埃委員都證明了的。馬克西莫夫同志說：和亨丘克不應該協議，而應該合理地商量。當我們在春天頒佈了第一個關於合作社的指令，而且他們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向我們提出要求，那時候我們向他們讓了步。我們把這個叫作協

議，——把這個政策叫作別的什麼是不行的。如果每一個蘇維埃工作人員把這當作常規，自己對自己和一切同志們反覆地說：同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合理地商量商量吧，——那我自己就滿意了。

我們至今在工作中，特別在地方工作中，對於合理商量還距離太遠。相反地，我們常常就不合理地商量。有些人責備我們這一點，他們不了解新的建設是不會沒有這個缺點的。沒有一個天才不學會建設而能建設新生活的。當我們需要和實際活動家們合理地商量時，我們却不善於這樣作。要開設一個小舖，就必須知道怎樣開設。需要有懂得自己行業的人。我們，布爾什維克，在這種實際工作中很少運用到自己的知識。我們很少缺乏鼓動者，但是實際領導者、組織者却驚人地缺乏。雖然我們有了一年的經驗，但這一情形至今還繼續着。和每一個在這方面有充分經驗的人，和每一個提出中立或善鄰關係的口號的人，都要合理地商量。如果他會開設小舖，分配商品，如果他能教會我們那怕是一點兒東西，如果他是一個內行，這就是很大的收穫。

任何人都知道，從我們勝利以來，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朋友」中間有很多的敵人。常常有一些完全不可靠的欺詐分子混到我們這裏來，他們在政治上動搖不定，他們出

賣、叛賣、叛變。這一點我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這是不會改變我們的。這在歷史上是不可避免的。當孟什維克責備我們，說在蘇維埃工作人員中間有大批混進來的、甚至在一般公民的意義上都是不忠實的分分子時，我們便對他們說：從哪裏去找更好的人，我們怎樣才能使這些更好的人一下子就相信我們呢？一下子就取得勝利並使人們信服的革命，是沒有的。它在一個國家裏開始，而其他國家的人們則不相信它。他們把我們的革命認為是惡夢，是一團混亂現象。其他國家的人們對我們的有組織的「混亂的」會議，對我們這裏稱為蘇維埃的會議，一點也不期望什麼東西。這是完全自然的。我們必須作出很多的成績來。所以，當人們說，應該合理地和亨丘克商量，他會開設小舖，——這時候我便要說，也和別人商量商量，使用那些會做很多事情的小資產者吧。

如果我們記住「商量」這個口號，在各個地方都牢牢記住這個口號，如果我們懂得是一個新的階級開始取得了政權，是一些從來沒有搞過複雜事情的人們在着手統治，而且自然會作出很多錯誤來，——那末，我們就不會感到難為情了。我們知道不可能管理得毫無錯誤。但是除了錯誤以外，我們還看到笨拙地把政權僅僅作為政權去運用的現象，即是，人們這樣說：我得到了政權，我發出了命令，你就必須聽從。我們說：對於很多

職工會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農民和合作社人員，不要實行這個口號，現在這個口號不再需要了。因此，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和知識分子更合理地商量，——這是我們的任務。當然，我們是從我們的立場上來商量的，我們是作為政權來商量的。

我們說，真的你們從敵對立場轉到了中立和善鄰關係的立場嗎，真的你們不再和我們敵對嗎。要不然的話，我們是不會閉上眼睛的，我們將開誠佈公地說：戰爭，就是戰爭，而且我們採取過戰時的行動。但是，如果你們從敵對立場轉到中立立場，如果你們講到善鄰關係，——這些話是我們從那些不屬於共產黨人陣營的人們的宣言中看到的，那些人昨天還遠較接近於白衛軍陣營，——那末，我說：既然有這樣的人，他們這樣大規模地從昨天的敵對立場轉到今天的中立和善鄰關係的立場，那我們就應該繼續自己的宣傳。

赫密里尼茨基同志白白地耽心，怕孟什維克進行自己的宣傳來領導工人階級的生活。我們不說那些不理解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我們不說他們，也不說小資產階級官僚分子，——在這裏要與孟什維克進行思想鬥爭，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如果對孟什維克說，他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對他來說是最厲害的侮辱；你愈加平靜地向孟

什維克證明這一點，他就愈加暴跳如雷。如果想把我們所獲得的地位分給他們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這都是錯誤。我們一點兒也不能讓步。

斯米特同志所舉的一些例子證明了：甚至有一部分比較接近資產階級的無產者（例如印刷工人），小資產階級職員，在工商業機關辦理事務的資產階級銀行職員，都會因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損失很多東西。我們封閉了大批資產階級的報紙，我們把銀行收歸國有，我們杜絕了很多銀行職員靠投機倒把而發財致富的門路，但是，就在這個陣營內，我們還看到了動搖，看到他們正轉向我們。如果說亨丘克因他善於開設小舖而可貴，那末，銀行職員就因他們懂得貨幣業務的技術而可貴，對於這個業務，我們中間雖然有很多人在理論上熟悉，但在實際工作中，則暴露出很大的弱點。於是我就和那懂得這個技術並且對我說他從昨天的敵對立場轉到了中立和善鄰關係的立場的人講起話來。我們說，要同任何人合理地商量。如果在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中馬克西莫夫同志執行這個策略（這個策略是他作為莫斯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主席團傑出的成員，在談到對於知識分子和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時說過的），那末，我將很滿意，而且將非常地滿意。

其次，是關於合作社的問題。斯杰克洛夫同志曾經這樣說過：合作社搞得很糟糕。

馬克西莫夫同志關於合作社曾經說過：不應該作出像人民委員會最近那樣的指令。在實際工作方面，我們沒有一致的意見。如果小資產階級不與我們敵對，那末，在這樣的立場上是應該和他們協議的，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新鮮的事情。如果過去的情況不好，而已經改變了的形勢又要求改變這種情況，那就應該改變它。在這方面，事情已經改變了，這是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的。在這裏，合作社要作一個顯著的榜樣。合作社機關是一個供應機關，它不能指靠資本家個人的主動精神，而要指靠勞動者自己大批的參加。考茨基在他叛變以前很久，曾經說得很對：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大合作社。

如果我們力求調整我們的監督工作，並且實際地為幾十萬人組織經濟，那末，我們就不應當忘記，社會主義者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經指出，富有實際經驗的托拉斯領導者對於他們是有用的。現在經驗表明，小資產階級分子從敵對立場轉到了中立立場。同時必須明白，他們是善於建立小舖的。我們不否認，亨丘克作為思想代表者是徹底滲透着資產階級偏見的，他們大家都發出這樣的臭氣，可是同時他們是有實際知識的。在思想方面，全部大砲都在我們這一邊，而他們却一門大砲也沒有。但是當他們說他們不與我們敵對，並轉到中立立場時，那末我們應當估計到，現在千百個不如亨丘克有本事的

人也在合理地商量了。我說，應該善於和他們商量。在實際建設方面，他們知道得多，有更好的本領，應該向他們學習。讓他們向我們學習我們對國際無產階級的影響，可是開設小舖，我們却要向他們學習。這件事我們不會辦。這裏在各方面都需要具有專門知識的技術家。

但是在合作社方面，我不懂得爲什麼那裏搞得很糟糕。當我們執行第一個關於合作社的指令時，我們不僅邀請了非黨人士，而且還邀請了遠較靠近白衛軍的人們到人民委員會來參加討論，我們和他們商討，我們問他們：你們能不能接受這個？他們說：這個——可以，而這個——不行。當然，從表面上、或不加思考地來看，這是和資產階級的妥協。我們邀請了資產階級合作社的代表，並且根據他們的意見刪去了指令中的若干條款。例如，刪去了關於無代價地使用和加入無產階級合作社的條款。我們認爲這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他們推翻了我們的建議。

我們說，我們必須和那些開設小舖比我們能幹得多的人們進行協議。在這方面我們是不熟悉的，但是在自己的鬥爭中我們是絲毫不讓步的。當我們頒佈下面同樣的指令時，馬克西莫夫同志說：不要寫這樣的指令，因爲指令上說要重新打開關閉了的合作

社。這表明莫斯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和我們一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誤解，而且甚至爲了消除這樣的誤解，竟須要舉行像今天這樣的會議和座談。我們會指出，爲了事業的利益，我們打算不僅利用一般職工會，而且也利用工商業職員工會，而工商業職員始終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柱。但是，既然這些人跑到我們這裏來，並且說：我們同意在善鄰關係上相處，——那末你們就要殷勤地歡迎他們，握他們伸出的手，而你的手不會因此掉下的。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明天英法帝國主義者來打擊我們，他們就會轉過身去，第一個逃掉。但是，當這一部分人，這些資產階級分子沒有跑掉的時候，我們就重覆地說：現在應該和他們接近。因此，我們通過了星期天公佈的指令，這個指令馬克西莫夫同志不喜歡，——他因而表明了他是運用不適合於新形勢的共產黨的舊策略。如果這個指令是昨天寫的，並且得到了職員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²⁾作爲答覆，那我們就成了傻瓜，我們會說，你沒有及時開始，你爲什麼在轉折已經開始、情況發生變化的時候寫這個指令呢？

武裝的資本家愈來愈厲害和頑強地進行戰爭，因此利用這個在實際建設中的即使是暫時的轉折，對我們來說也是極端重要的。全部政權都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不分閉合

作社，重新打開封閉了的合作社，因為我們封閉這些合作社是在它們爲白衛軍的鼓動服務的時候。但是任何一個口號都可能使自己過分地硬化起來。當俄國掀起封閉合作社的浪潮而且進行追究它們的時候，——那末這是當時的條件所要求的。然而現在並不要求這樣。要有一個和中農相聯系的很重要的機關，這個機關把零碎的分散的農民階層聯合起來。這些亨丘克分子做着資產階級分子所建立的一件有益的工作。當這些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他們從敵對立場轉到中立和善鄰關係的立場時，我們應當說：我們所需要的就只這一點。那末，善良的鄰居，讓我們合理地商量吧。我們會盡一切力量協助你們，實現你們的權利；我們會研究你們的要求，給你們一切特權，不過你們要完成我們的任務。如果你們不做到這一點，那末，你們要知道，非常委員會的全部機器都在我們這裏。如果你們不善於使用自己的權利，也不完成我們的任務，那末，整個國家監督機關都在我們這裏，我們將把你們看作國家意志的破壞者。你們必須向我們交待賬目，直到最後一文錢爲止，而違反這一點將作爲破壞國家意志和國家法律而受到懲罰。

這整個監督權都在我們手裏，可是現在要把這些人吸引過來，那怕是暫時的也罷，——從國際政治的觀點來看，這並不是巨大的任務，然而對於我們却是極其必要

的。這會加強我們在戰爭中的地位。我們沒有很大的後方。這會給我們道義上的勝利，因為這會告訴西歐帝國主義：它將在我們這裏遇到足夠嚴重的反擊。它不能忽視這一點，因為在每個國家裏都有他自己的反對政府侵略俄國的工人的無產階級的反對派。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想，既然可以就馬克西莫夫同志的聲明來判斷，那我們就會找到一定的意見一致。如果也暴露出了意見不一致，那末這些不一致的意見也不十分重大，因為既然承認了對於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知識分子、合作社人員，對於還未承認我們的職工會必須合理地商量，而且我們只要不放棄政權，堅決地在整個冬天執行這個政策，——那末，我們就會得到對於國際革命事業講來很大的好處。

一九二九年第一次刊行

按照速記稿掛印

簡要註釋

(一) 俄共(布)中央在一九一八年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最重要問題舉行了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莫斯科黨工作人員會議專門討論了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問題。列寧做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見正文第一頁)。

(二) 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一文，發表於一八九四年的「新時代」(Die Neue Zeit)雜誌(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四〇一——四二二頁)。——(見正文第二頁)。

(三) 見恩格斯著「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四一四——四一五頁、第四一六頁)。——(見正文第三頁)。

(四) 見恩格斯著「法德農民問題」(同上，第四一九頁)。——(見正文第三頁)。

(五) 同上。——(見正文第一九頁)。

(六) 見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一卷，第四七九頁)。——(見正文第二二頁)。

(七) 見恩格斯著「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四一四——四一五頁)。——(見正文第二二頁)。

(八) 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三九六頁、第四〇二頁。——(見正文第二四頁)。

(九) 是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月在「職員通報」第十一——十二期上所刊載的全俄職員工會代表會議的決議。——(見正文第三三頁)。